

口述历史

联合主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南方都市报
执行主编：王 钧

我的一九七六

★1976年，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大悲大喜——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窃国乱权者走向末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正在远去，追怀历史留住历史，★为了今天更好地前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I251/112

2008

口述历史

联合主编：广东省党史研究室 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南方都市报
执行主编：王 钧

我的 一九七六

1976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一九七六 / 《南方都市报》主编.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652-686-6

I. 我... II. 南... III. 广州市—地方史—史料—1976 IV. 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244 号

我的一九七六

主 编: 南方都市报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市桥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20

印 张: 14

字 数: 252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的**一六六**

编委会

主 任：陈俊凤 江艺平 禔兆强

编 委：叶文益 钟裕铨 庄慎之

王 钧 魏海波

执行主编：王 钧

特约编辑：刘子健 黄穗生

编辑统筹：刘丽君

采写撰稿：许黎娜 王海军 方夷敏 王 瑾

出版统筹：张 超 黄兆晖

编辑助理：许雨萌

序 言

一次对于历史真相的寻访和记录

尝试作 1976 年的叙事，对于大多出生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南都人来说，更多是补课。进入 2006 年，适逢粉碎“四人帮”30 年之际，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产生对这段历史浓厚的窥视欲，而这种欲望，可以穿破一切禁忌，抱着对生者轻叩心扉的小心和慰问，抱着对无辜遭难者探询追忆的缅怀和敬意，开始试图去还原历史的真实。

很巧的是，在这个操作的团队中，除了我算是个 70 年代初出生的人，其他创作人员，包括编辑和记者，都是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人。于我而言，在搜肠刮肚了一番早年的碎片记忆后，发觉只剩下毛主席逝世那段，全家人围桌折小白花，戴印有“毛主席永垂不朽”黑袖套的印记。靠我的经验和阅历，不能为这个专题提供应有的素材。倒是大学时代，由于伤痕文学的接触和早年北岛、舒婷、顾城一类诗人的熏陶——“黑暗给予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很想探究，是什么力量，能产生这样的文字和对于自由的欲望？对 1966 年到 1976 年那一段历史叙事，我一直满怀叩开门扉的激情。而今，是个好时机。1976 是我们叙事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魏海波也是这个题材的始作俑者，他正好生于 1976 年。2006 年于他是而立之年。出这个点子，我揣摩也是他对自己安身立命、身处传媒求达真相的一次表达和释放。他身后有一个 70 多人的采编团队，只要有好想法，不怕没人响应。当然，我们最初的野心是放眼中国的大叙事，但受阻于战线过长和历史档案渐进开放进程中仍然存在禁

忌，于人脉资源于大历史把握都有相当的难度，我们最终选择把视线放在广东广州。

张纯，现在北京，是作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派出的一名媒体从业人员支持奥运，做一名服务于奥运新闻报道的新闻官。但2006年时，这个题材得力于她把想法落实成方案。我们认为1976年是中国历史的拐点，也是不少人命运的转折点，人们对1976年有深刻的集体记忆。30年前那一系列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社会生活事件，广州人是如何见证、亲历的？1976年的广州，社会生活各方面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有哪些值得重温的片断？找寻有意思的话题，复活个人的记忆，从微观的角度着手，见微知著，从人物切入，寻访合适的口述者，他们可以是政要名人，也可以是普通百姓，但必须是具体事件的亲历者，有口述价值。

是的，既然历史我们都无知，更不能说书写。但可以口述和记录，我们选择了倾听和口述的形式，在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仍健在时，留下它。选择口述，应该说它本身提供了一种现场感，也不受第三方转述的限制，是最易于让受众产生“在场感”的一种表达。你可以轻易地进入当事人设定的场域里，走进历史，有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一个问题或许应该提及，作为一张新闻纸，为什么会花大力气去整理历史？新闻和历史其实有天然的联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对于过往历史的重述，无非是想获得更接近真实的新闻事实，而这个，不可讳言，每一代人都有努力澄清和重新关照历史的任务，它既是历史学者的职责，也是作为当下历史记录者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在口述人物的选择方面，应该说，我们煞费苦心。那些拥有历史的良心、曾经在危难时刻坚守正直原则、曾经遭遇过不公正境遇的善良人们，他们或在当时权倾一时，或用生命经历坎坷，但都本着面对垂垂老去的生命和已经消失的青春年少，愿意说出历史的真相，呼唤历史的良知和正义。

刘丽君、许黎娜、王海军、王瑾、方夷敏，他们都是南都一线采编工作人员，在全年的投入中，一方面是日报大量的烦琐工作，另一方面要抽出业余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兴趣采访和专题执行。他们翻阅有限

的资料，联系受访者，也一次次在倾听中无限震撼感悟生命并更珍惜职业带来的荣耀和使命感。所以，这个题材，于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更是一次寻访历史真相的教育。“不管这个‘真相’是存在于新闻还是存在于历史，甚至是存在于‘风险’中。而这种追索中的勇气与智慧，也正是我们常常说的南都的‘风骨’”（引自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在南都新闻评奖中对“1976·广州口述史”的意义评价）。

这一批报载口述作品，采编人员历时8个月时间，分33期刊载在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版“人物”栏目里。能够出版付印成书，则要归于南都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那就是愿意为记录历史担当使命，作出承诺并付诸实施。感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女士作为受人景仰的报人给予我们的信心，感谢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先生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与我们一起分担。

既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又要避开政治敏感难题，确实也是当下语境下绕不开的难题。感谢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叶文益和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处处长黄穗生，还有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原所长陈登贵提供的专家支持和审稿把关。也特别感谢省档案馆允许我们去查阅刚开禁的史料。这不是一本赚钱的书，甚至要筹备它的出版经费也颇费周章。将这一批口述作品辑录成书出版，得力于广东省和广州市党史部门的推动。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俊凤、副主任叶文益，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禰兆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本书出版事宜，审读书稿，并用他们的经费给予了出版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个人工作烦琐的原因，本书更多的编辑工作是由南方都市报部门首席编辑刘丽君女士代为打理。一年巨制，33期专题、20万字实录承载80个广州人回忆的“1976·广州口述史”，在南方都市报2006年新闻大奖评选中获得新闻策划类银奖，而广东省档案馆也以“南方都市报”为名将160个小时的访谈录音作为史料收藏。

新闻前行的力量正来自对历史的感知和现实的努力！

王 钧

2007年10月10日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助理）

序言 一次对于历史真相的寻访和记录 / 001

第一篇 数风流人物 / 001

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忆“文革”岁月：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 / 002

张根生：1976年，我任广东省委书记 / 007

周秉钧：伯父周恩来亲自签署我父亲的逮捕令 / 016

“岭南词宗”之子、语言学家詹伯慧：我与父亲的运动劫 / 032

广东省委原常委杜瑞芝：不瞒产死人更多 / 038

马鼎盛：因为母亲红线女我差点上不成大学 / 046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把我推向权力的顶峰 / 054

谭元亨：《园丁之歌》送我劳改 / 065

老干部李美清：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 / 073

经济学家赵元浩：保全性命于乱世就是胜利 / 079

庄辛辛：从“反革命分子”到“四五”英雄 / 082

第二篇 一九七六那些事儿 / 093

悼周总理，那时要偷偷地 / 094

8050人晕倒在毛主席追悼会上 / 106

提着脑袋排演《霓虹灯下的哨兵》 / 117

“6·12”长堤大火：百人捧“红宝书”冲进火海 / 122

- 唐山地震，广州医疗队千里驰援 / 132
- 广交会采购谈判前须念毛主席语录 / 151
- 白云宾馆接待外宾“九不准” / 158
- “南大”楼顶架机枪，营业员加入民兵连 / 166
- 尼克松要我唱首歌 / 171
- “四人帮”倒，越秀山十万人集会上许世友亲令放鞭炮 / 177

第三篇 热血写春秋 / 181

- 广东唯一赴藏知青队 30 年前出发 / 182
- 清平路摆摊挖到第一桶金 / 199
- 练泳技藏气枕，文弱书生决心逃港 / 203
- 广州市知青办原副主任杨丰：人人都巴结我们 / 214
- 广州知青的最痛：海南山洪冲走 20 姐妹 / 218
- 水瓶胆里珍藏“四五运动”底片 / 231
- 半年知青，十年黑户 / 239
- 杨小村：我组织广州红卫兵赴京 / 244
- 长堤枪战，为战友抬尸游行 / 253
- 徒步 99 天赴京串联 / 263

第一篇

数风流人物



讲述背景

“没有老虎就抓只猫”，回忆起自己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差点被抓出来当批斗对象，林若幽默地打了这个比方。

老人的笑声背后，却透出了在那个荒谬年代，他的无奈、压抑，还有战战兢兢。

林若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波折起伏。“文革”一爆发，他就被打成“走资派”。一直到1971年才恢复工作。这段受冲击迫害的经历，令他一度不敢脱稿讲话。

当报人，他如履薄冰，时刻要与上头“对口径”。

管广州郊区农业工作，他坦承“成绩很一般”。

“遗憾”——这是老人谈起“文革”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假如没有这十年，他相信自己可以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以史为鉴。“文革”的历史应当让国人了解、反思。这是老人在八秩之年的希望。

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忆“文革”岁月：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

■讲述人·林 若



82岁，广东潮安人。青年时代就读于中山大学文学院，积极投身抗日运动。1949年10月，到东莞参加土地改革，任中共东莞县委宣传部长，后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20世纪60年代，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70年代，任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湛江地委书记。1982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1985年9月前设省委第一书记）；1991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说起1976年，令我最难忘的事，该是周总理去世后，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那时当广州市委书记，运动一来，有人又想抓我的辫子做“运动对象”。我赶紧找了市委领导反映。可能是市领导的话起了作用吧。也是十年动乱，上上下下搞运动都搞得很疲惫，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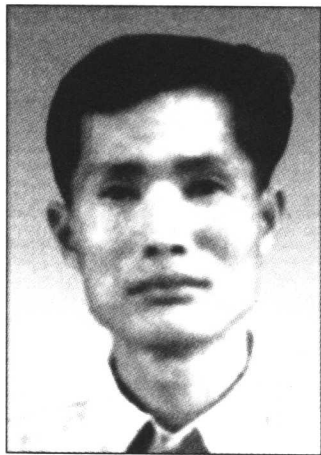
“文革”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不幸，经历了很多挫折。直到最后，对我个人来说，才明白过来：

这条弯路，我们不能再走。

“自投罗网”被打成走资派

我从东莞调到湛江（1966年林若调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没多久，“文革”开始了。

我刚离开东莞，东莞的造反派就起来了。可是斗来斗去，没有斗争对象怎么斗？当时东莞的新领导刚到不久，而我在东莞工作那么久，缺点肯定是有的，一一罗列搜集起来就不得了了。有人提出要到湛江去抓我。



▲ 年轻时的林若。

我那时思想太单纯了。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众的教育。在这种形势下，我写了封信说：我工作有缺点问题的，需要我回来做检讨，也可以啊。哈，这不就是“自投罗网”了？接到我的信以后，东莞方面马上来抓我。

人家给我扣的“帽子”，名字很唬人——“三反分子”，说我是“走资派”、“保皇派”，反党、反社会主义。

解放后，我在中山县、东莞县搞土改，当队长。土改时，我认为某些人出身不纯、包庇地主，不能参加土改队。那些被开除出队的人不就恨死我了？到“文革”的时候，那些人便拿这些事来批斗我。这不就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苦笑）

我在东莞，先是被拉到县城礼堂开批斗大会，完了，又拉到下面的公社去斗。斗了几个月，“靠边站”到东莞干校劳动，一直到林彪出事了，1971年，我才被“解放”。

一度受压抑不敢脱稿说话

被批斗之前，我在湛江当地委书记，再调回去当湛江地委常委。这是上面要考验我一下，看我表现怎样，会不会趁机叛党，会不会口出怨言，还能不能当书记……

说实话，我被批斗了那么一段时间，生理心理都有压力。我本来

讲话很随便的，经常临场发挥脱稿讲话。而“文革”中，受“四人帮”影响，咬文嚼字很厉害，专门抠字眼。因为讲错一句话，就要抓人辫子，讲深一点、讲浅一点，都有危险。

因为这个，我倒退了，梗塞了，表达不舒畅了。开会的时候，我只能拿着一个稿纸结结巴巴地念，表达不出思想感情，也表达不了思想观点。

在湛江工作不到一年时间，我一直感觉自己很不适应，不能挥洒自如。

后来，回到广州市工作，我第一次讲话，就跟同事们申明：我这个人讲话的习惯是不念稿纸的，因此有时候，语言讲得过火或者讲得不够，是经常发生的，请大家原谅。我这么说，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去抠，那样就没有意义。

如履薄冰当报人

1971年底，我调到《南方日报》工作。这叫“没有马就找头牛来”。（笑）

组织上安排我到报社，主要是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比较年轻，还有点文化基础。进报社工作之前，我一直从事农村的行政工作，管农业。我不懂办报，也不适合文字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的，而且当时搞舆论宣传工作，很难。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报纸宣传面广，影响也很大，我只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办报政治敏感度要高一点，否则，糊里糊涂就会碰鼻子。

我和报社几个领导经常轮流上夜班。头版怎么排版，大标题、小标题怎么定，语言表达是否符合当时的形势，这个很重要。自己拿不准，就打电话问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快呢，晚上十一二点就定版了；慢呢，要等到凌晨三四点，甚至四五点才定版。

观察形势也非常重要，要和中央对口径，不能超越，更不能违反。要是出现另一个口径，那就要犯政治错误了。

幸好，在报社工作那3年，没有出过什么错。提高了文字水平，算是最大的收获。

管农业工作我成绩一般

1974年，在广东省委运动办工作了半年。之后，我就被调到广州市委当书记，分管广州7个郊区县的农业工作。

我在广州管农业工作那3年，成绩很一般。因为当时的农业政策没有改变，我也是老思想，没有突破那个框框。

广州的粮食生产一直都在徘徊。年景好，增点产；年景不好就减产。还是靠天吃饭，突破不了那种沉闷的局面。这关键还是受政策上的束缚，缺少重大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那时，一个生产队里多少亩地种粮食、多少亩地种经济作物，都是规定死了的。少种还要追究责任。我发现，盛产粮食的大队，种得越多，反而越穷。粮食价格是管死的，生产多了，又要加重任务，种粮食是很吃亏的。而且，这对耕种制度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良田不能增殖，土壤肥力不能增加。

“文革”后，我回到湛江去工作。这个时候，政治形势比较稳定、比较宽松，我下去农村调查时，发现湛江有1000多个生产队的农民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粮食总产量明显提高。

那时省里还是公开指示，反对搞“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我因此不跟上面声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中支持。

“文革”虽然结束，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基层干部还是过去的老一套，思想僵化，多少年习惯走集体化道路，一下子接受不了“包产到户”。有人形容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让农民分田单干，这不就又回到解放前了吗？有些基层干部还有失落感——农民自己干，就不需要干部来指手画脚。

一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这种偷偷摸摸的局面才结束。

广州一直观望北京的动向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后，掀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闹了十年动乱，从上到下都很疲惫，但是运动来了，不跟上形势，

没有抓出几个斗争对象，又交代不过去。那时，广州一直在观望北京的动向，思想上比较混乱。

“反击右倾翻案风”很明显就是“四人帮”搞的阴谋。这场运动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四人帮”就垮台了。

在官场中，利用政治运动搞打击报复、倾轧其他人的毕竟是少数。“文革”中各种运动，历来都是这样：人家搞起来了，你搞不起来啊，那就说是不是你本身有什么毛病、还是在包庇什么人。不反右倾，就说你本身就是右倾。那个年代，上面一有什么指示，哪怕不愿意搞，下面都要做个样子应付一下，没有“老虎”也要找只“猫”出来。

不反思“文革”后果难料

“文革”那10年，我变化起伏很大，回过头来看这10年，如果不是经历那个时代，我想我的工作可以做出多一些成绩来。

我当时正是40多岁，对个人来说，是黄金时期，精力最充沛、最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结果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天到晚“搞搞震”，时间消磨掉了，人的命运也改变了。

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觉得一些做法不是很妥当，但却只能跟着政治形势走。有想法也不能透露出来，只能藏在心底。回头再想想，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完成。这是我的遗憾，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的共同遗憾。

现在我们国家的路线是走对了。但是对“文革”这一段历史，有必要让后人去了解它。有句古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不反思“文革”历史，很难说以后会不会重演。

张根生：1976年，我任广东省委书记

老领导张根生总结在粤工作20多年经验教训：
我们也干了很多傻事。



■讲述人·张根生

1923年生，原籍河北安平。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长期在广东工作。1956年后任广东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一度被监护审查。1970年后，任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副书记。1972年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7年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常务副部长。1979年后，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务书记、省长。1985年后，任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包产到户流产

1976年，我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关于这一年的印象就是乱，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而到了年底终于迎来“四人帮”倒台，又是一件大喜事。“文革”中“左”的思想终于开始得到批判，中国又逐步走上正轨。



讲述背景

30年前，张根生任广东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作为广东省最主要的领导人和决策者之一，他往返于北京和广州之间，在国运兴衰的转折点，亲身见证了省内乃至国家高层各色人等在生死关头的表演和挣扎、抉择和抗争。

他说，1976那一年中国灾难深重。关于这一年的印象就是乱，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而到了年底终于迎来“四人帮”倒台，又是一件大喜事。“文革”中“左”的思想终于开始得到批判，中国又逐步走上正轨。

老人以1957年为界，将自己的一生一分为二，并称后半生的前20年为“坎坷二十年”，他诚恳地说，“我们党成了执政党，我们都做了官，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也干了很多傻事，犯了许多错误”，究其原因，在于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缺乏，在今天，这依然是国家建设的努力方向。

其实，“左”的思想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只不过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要是问我一生革命中经历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那还是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全省水肿病人上百万

当时，我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候补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因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就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广东的农田减少了几百万亩，耕牛死了1/5，粮食亩产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有些农村每人每月只有20斤口粮。

有一次，我到龙川县龙母公社搞试点，亲眼看到公社的医院、学校都住满了水肿病人，有二三百人。全省的水肿病人更是高达上百万。

面对这种情况，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商量对策。会议于1959年5月在汕头召开，会上气氛较宽松，大家畅所欲言，集中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等。

我记得赵武成（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发言最尖锐，也最具有代表性。他说大跃进“一是脱离实际，一是脱离群众”，说“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上却是万马齐喑”。

会议最后，陶铸和省委常委都作了自我检讨。会后，陶铸还写了两篇文章。《松树风格》，强调要有革命坚定性；《太阳的光辉》，说太阳也有黑点，比喻我们工作中也会有错误，但要有正确的认识。谁想到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这就是后话了。

对广东来说，这次会议是个转折。省委开始大力纠正共产风，拿出3.5亿元退赔损失。还连续发出好多文件，放宽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逐步停办集体食堂，使广东在全国较早度过了困难时期。

但是，纠“左”仍有局限性，当时没敢触及人民公社等所有制问题。而且，刚过两个月，中央就召开了庐山会议，又来一个全党大反右倾。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气氛很紧张。尤其是在汕头会议上发言批评大跃进的人，更是胆战心惊。赵武成赶紧写了一份检讨书给陶铸，请求省委处分。陶铸把检讨书交给我，说退给赵武成。